

光復初期臺糖的銷售問題 ——十五萬噸敵糖的來龍去脈（1945-1947）

程玉鳳

摘要

本論文研究之緣起，肇因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理大綱42條款中有一項要求中央歸還15萬噸糖，未悉其與228事件有何關係？此外，坊間書籍有陳儀用15萬噸糖與中央交換法幣不在臺灣發行之說，類此說法難免令人質疑。故本文主要在探討臺灣光復初期，政府接收日本15萬噸敵糖的來龍去脈及其影響。首先，敘述15萬噸敵糖的來源，原是在戰後日本留存臺灣約34萬餘噸的砂糖，嗣因各種原因及耗損，至1946（民國35）年3、4月間，始確知砂糖數量只剩下約15萬噸。其次，分析何以中央與地方爭相獲得這批敵糖？行政院下令歸中央所有後，臺糖公司奉令代運至上海銷售，所得糖款全部收歸國庫，地方並無所得，因而導致民怨。再次，考證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是否曾以15萬噸糖送給中央政府做為交換條件，以阻止法幣在臺發行？經據檔案史料考證分析，並將兩者發生時間交叉比對推論後，證明此說法乃是以訛傳訛之誤。最後，敘及白崇禧來臺宣慰調查後提出臺政改革意見之一，就是建議將15萬噸糖銷售所得一半撥還臺糖公司，以消除民怨，經蔣中正主席批准後，臺灣省終於得以收回二分之一食糖的貨款，由此印證15萬噸糖與228事件民怨確實有密切關係，此有助於228事件發生原因的探究，也是另一項史料的重大發現。總之，本文旨在試圖釐清歷年來史學界對於15萬噸敵糖的爭議性課題，並瞭解其對光復初期臺灣經濟社會的影響。

關鍵詞：臺糖、敵糖、臺糖公司、資源委員會、柯遠芬、陳儀、沈鎮南。

The Sales of Tai-Sugar during 1945-1947: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150,000 Metric Tons of Sugar Obtained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Yu-feng Cheng^{*}

Abstract

In Item 42 of the Outlines for Handling the 228 Incident, it regulated that there is an amount of 150,000 metric tons of sugar to be return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 It is quite interesting to know what the sugar had to do with this Incident. It arise a rumor that Chen Yi used the 150,000 metric tons of sugar to trade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order to stop it from issuing legal currency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takeover of 150,000 metric tons of sugar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t was said that there had been more than 340,000 metric tons of sugar left by the Japanese after the war, but in reality only 150,000 metric tons was found in the spring of 1946.

Why did t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ry to seize this sugar? The Executive Yuan announced that the sugar belonged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ordered Tai-sugar Company to sell it in Shanghai and the obtains should all go into the national treasury. This enraged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This paper further cites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trade between Chen Yi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the sugar was a mere speculation. Furthermore, it found that the investigation made by Pai Chung-hsi finally provided a suggestion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return half of the gains from the sales to Tai-sugar Company to appease the people. This suggestion was later approved by Chiang Kai-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shek and part of the sugar money was returned to Taiwan Province Government. In this sense, the sales of the sugar did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228 Incident.

Keywords: Tai-Sugar Company, The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 Ko Yuan-fen, Chen Yi, Shen Cheng-nan.

光復初期臺糖的銷售問題 —十五萬噸敵糖的來龍去脈（1945-1947）*

程玉鳳**

壹、前言

糖業是日治時期（1895-1945）以來臺灣最大的工業，其產業對臺灣的經濟發展影響頗鉅。抗日戰爭結束後，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於1945（民國34）年10月25日在臺北市中山堂接受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的降書，臺灣終於脫離日本五十年來的殖民統治，重回祖國懷抱。但是由於戰爭期間盟軍飛機的轟炸，臺灣所有重要工廠的機器廠房設備都橫遭破壞，殘破不堪，而如何使各項產業恢復生產，經濟復甦，人民能夠安居樂業，遂成為來臺接收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員的極大挑戰。以糖業為例，當時四個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所屬的42個糖廠，有百分之八十被炸燬，只有8個糖廠是完整的，到處是斷垣殘壁，生產線幾乎停擺。經濟部在臺灣地區成立臺灣區特派員辦公處，資源委員會奉命負責全國工礦業的接收重建工作，派遣各單位的技術人員來臺灣，分成五組，其中糖業組由沈鎮南負責，並擔任糖業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領導臺灣糖業的接收重建工作。

臺灣光復不久，適逢糖廠開工時期，由糖業監理委員會先拼湊出17個糖廠開工生產，產量只有8萬多公噸，這是戰後第一次生產的砂糖。翌年，因大部分糖廠都在整修，加上甘蔗種植量減少，以致產量只有3萬多公噸，兩個年度的砂糖產量合計只有11萬多公噸。當時臺灣砂糖市場的主要來源，除了新生產的砂糖外，就是日治時期留下的存糖，謂之「敵糖」，還有公私機構和民間留存的食糖，存糖有限，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又禁止民間私運砂糖出售，指定由臺灣省貿易局包辦分配與銷

* 本文為獲選國史館國史研究獎助之論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9年3月31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6月19日。

**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售業務，以致造成糖價上漲。砂糖是臺灣光復後除了米之外的主要物資，這些砂糖的銷售，對於當時臺灣經濟有很大的影響。

筆者於年前著手撰寫有關臺糖與228事件的論文時，閱及黃彰健院士的論文〈揭穿王添灯欺騙臺灣人民—論二二八處委會3月6日提出處理大綱32條、3月7日提出42條、3月8日提出32條〉，發現「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於1947年3月6日、7日通過發布的42條款，其中附加的10條「政治項」最後一條竟與臺糖有關，內容如下：

送與中央食糖15萬噸，要求中央依法估價，撥歸臺灣省。¹

黃文中還考證此條文是在何時出現？其版本與美國領事館有何不同？是否經過王添灯修改？讀後頗感驚訝。緣以砂糖是一種民生食品，何以與政治改革有關？又臺灣於何時將15萬噸糖送給中央？何以把15萬噸糖送與中央？尤其是這15萬噸糖與228事件的發生是否有關？這些問題都亟待釐清。於是筆者決定探討15萬噸糖的來龍去脈，開始蒐集相關檔案資料，終於有了初步的發現。

首先是臺糖公司總經理沈鎮南於1947年3月3日上電資源委員會，提出在228事件後糖業方面需要解決的三件事，其中一項就是關於15萬噸敵糖的處理。內容如下：

中央接收敵糖15萬噸，民間甚表憤慨。臺灣物價高漲，幣值低落，均歸咎於糖款不能回臺所致。……²

由此電文可知15萬噸敵糖的嚴重性，因為臺灣的15萬噸敵糖被中央接收，導致「物價高漲，幣值低落」，臺灣人民憤慨萬分，所以要求將所賣糖款撥還臺糖公司，以穩定幣值，由此可見其所累積的民怨，似乎與228事件發生的原因離脫關係。

而後又在《臺灣的糖業》一書看到「十萬噸糖的代價」標題，內文如下：

-
- 1 見黃彰健，〈揭穿王添灯欺騙臺灣人民—論二二八處委會3月6日提出處理大綱32條、3月7日提出42條、3月8日提出32條〉，《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2月），頁430-457。賴澤涵、黃富三等，〈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2月），頁66-71。
 - 2 「臺灣糖業公司沈鎮南等為糖業弊病及物價高漲幣值低落引起人民反對情形致資源委員會電」（1947年3月3日），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頁163-164。

民國35/36年期未受損之八廠，產糖3萬餘噸，連同上年期，共有10萬餘噸存庫糖。這批糖做為糖廠修復及發展糖業就綽綽有餘，但更嚴重的是，臺糖公司卻將此批糖直運上海。由於陳儀為保臺灣經濟穩定，拒絕中央四大銀行接收臺灣財政，就將此糖產交由南京中央政府處理，亦即臺灣糖業的利潤流向大陸，用臺糖大量的供糖來抑制當時大陸因通貨膨脹而造成的物價波動，但卻助長臺灣本身的通貨膨脹。但從好的一方面來說，臺灣也因此脫離中央的金融體系。……由關鍵10萬噸糖換來一國兩幣的發行，終極是雙贏的。³

根據該文的敘述，陳儀為了使法幣不在臺灣流通，曾經以10萬噸糖交給中央政府做為交換條件，因而使大陸嚴重的通貨膨脹不致於影響到臺灣，所以用10萬噸糖換來一國兩幣的發行，是值得的。如此則出現兩個問題：其一，送給中央的砂糖究竟是15萬噸糖或10萬噸糖？其二，臺灣之所以不流通法幣，是否是陳儀用臺灣砂糖與中央交換而來？然而其所根據資料為何？由於該書為一般通俗性書籍，並未註明資料來源，於是筆者先向該書作者請教，經過多次查詢，始悉是從李敖的「笑傲江湖」節目「李敖有話說」而來。⁴細讀其全文，得知李敖是根據柯遠芬於1984年在美國普林斯頓所寫的回憶錄《陳儀先生其人其事》。⁵但因未能見到柯遠芬的原文，經多方搜尋，終於查獲柯遠芬另外一篇文章〈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像〉中有同樣的敘述：

……而其中尚有一交換條件，即臺灣以接收的臺糖10萬噸（編按：柯氏口述為15萬噸）呈獻中央，以補助中央困難的經濟。……⁶

從柯遠芬的回憶文章，可以確知三事：

一、10萬噸糖乃是15萬噸糖之誤。

3 陳明言，《臺灣的糖業》（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2月），頁108。

4 〈炒作悲情 竄改歷史〉（1月10日），《李敖有話說》，第221集。
見<http://creazywang.bookse.net/talk/221/221.htm>

5 〈炒作悲情 竄改歷史〉（1月10日），《李敖有話說》，第221集。
見<http://creazywang.bookse.net/talk/221/221.htm>

6 魏永竹、李宣鋒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1年2月），頁573。

二、陳儀用15萬噸糖作為交換條件，使法幣不能在臺灣流通。

三、陳儀阻止法幣流通臺灣，使臺灣金融獨立，對於臺灣經濟財政很有貢獻。

根據行政院檔案及財政部檔案，當時陳儀確曾阻止法幣來臺，並以臺灣銀行發行的「臺幣」做為臺灣使用的通貨，但是柯氏說中央與地方以15萬噸糖做為暗盤交易，此一交換條件的說法是否可信？而陳儀一定必須以15萬噸糖作交換才能達到法幣不來臺灣的目的嗎？此又成為急需求證的問題。因為這個說法已經被多篇文章所引用，不僅可能誤導讀者，甚至將造成錯誤的歷史書寫。

此外，其他文章雖曾談及15萬噸糖運送中央，但多不知其所以然。例如何漢文的〈臺灣二二八起義見聞錄〉：

……蔣政府資源委員會提出在1947年內要臺灣供應15萬噸無償的臺糖、3,000萬噸至4,000萬噸臺煤、和50萬噸大米等任務，加緊對臺灣經濟資源的掠奪。⁷

許介麟的〈陳儀是土皇帝嗎？〉一文如此敘述：

蔣介石命資源委員會將大量的糖免費運送至大陸，致使臺糖無經費可用時，臺灣銀行只得採取加印鈔票的方式借款給臺糖對應。⁸

但並未說明何以臺灣必須免費運糖至大陸。

至於較為深入論及15萬噸糖的論文，則為吳聰敏的〈臺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在「公營企業」一節中敘述臺糖公司因捐獻15萬噸糖的損失，造成資金缺乏，只得向臺灣銀行大量借貸，但亦未能敘明其來源，及其與法幣之間的關係。⁹

本文的研究，旨在探討15萬噸敵糖的來龍去脈及其意義，必須解決的問題如下：

一、何謂15萬噸敵糖？其確實數字如何？來源如何？

二、光復初期臺糖的銷售狀況如何？

7 何漢文，〈臺灣二二八起義見聞錄〉，收入於李敖，《二二八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2月28日），頁117。

8 許介麟，〈陳儀是土皇帝嗎？〉，《戰後臺灣史記》，卷一（臺北：文英堂出版社，1996年9月），頁77。

9 吳聰敏，〈戰後臺灣的惡性物價膨脹（1945-1950）〉，《戰後1950-60年代的歷史省思—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八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7年12月），頁652-653。

三、陳儀是否可能將臺灣砂糖送給中央？

四、陳儀是否確曾以15萬噸糖做為法幣不來臺的交換條件？

五、15萬噸糖是否與228事件的發生有關？

六、15萬噸糖的下落如何？

本文運用的第一手史料，包括行政院檔案、財政部檔案、臺糖公司檔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和臺灣省貿易局檔案，以及相關當事人的回憶錄，或其他已出版的專書及論文。經將上開資料交叉比對，並加以考證分析後，大致上獲得如下結論：

一、證明法幣不在臺灣流通，與中央接收15萬噸敵糖並無關係，故陳儀並未以敵糖做為交換條件。

二、陳儀以他個人的意見與堅持，使中央不得不同意臺灣金融體系獨立，由臺灣銀行發行臺幣，形成一國兩幣的現象。

三、1947年4月間，白崇禧的「改革臺政意見書」，獲得蔣中正批准，將15萬噸糖的半數撥歸臺糖，總算是回應臺灣同胞的要求，以平息民怨，臺糖公司也獲得應有的重建經費。

以下將分成四節探討：首先探討所謂「15萬噸敵糖」的由來，提出其正確的時間及數量。其次，敘述光復後臺糖的生產和銷售狀況，臺灣省貿易局和臺糖公司各自扮演何種角色？由此再考證15萬噸糖與法幣的關係，探究陳儀是否曾以15萬噸糖做為交換條件？從行政院檔案、臺灣省貿易局檔案和臺糖公司檔案得知，15萬噸敵糖提出的時間是在行政院同意法幣不通行於臺灣之後，由此證明15萬噸糖與法幣不來臺灣流通並無關連。最後，探討15萬噸糖的去向，結果是中央同意將所剩下一半的15萬噸糖歸還臺糖公司，終於解決了15萬噸糖的爭議性問題。最後結論則總結15萬噸糖的探討研究的成果，分析其與228事件的關係，並提出歷史研究與口述資料運用上的若干盲點，期能有助於光復初期臺灣糖業發展史的研究。

貳、十五萬噸敵糖的由來

抗日戰爭結束後，經濟部與戰時生產局於1945年9月成立「臺灣區特派員辦公

處」，特派員是由資源委員會工業處長包可永擔任，其下分設糖業組、機電組、冶化組、輕工業組、礦業組等五組，組長分別是沈鎮南、劉晉鈺、湯元吉、謝惠、金開英。這些奉派來臺灣接收工礦業的人員，先後於是年10月及11月底抵達臺灣。糖業組的接收，分成兩個階段進行，先監理後接管，於11月26日先組成「臺灣糖業監理委員會」，於12月1日開始監理的工作，至1946年4月15日止。當時糖業監理範圍包括日治時期的四大製糖株式會社：日糖興業株式會社（簡稱日糖）、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簡稱臺糖）、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簡稱明糖）、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簡稱鹽糖），及日本糖業聯合會臺灣支部、酒精輸送株式會社、明治產業株式會社、東亞冰糖株式會社……等17個單位。監理時期各會社的業務及生產工作，仍由原有日人負責進行，監理人員的主要任務為調查各監理單位的組織、人事、資產、股權、債權、債務等情況，以及兩年來生產物資移動和保管情形，並督促各單位繼續推行原有業務，計劃修復工廠，尚未做移交的工作。

迨至1946年4月1日，監理委員會奉命改為「糖業接管委員會」，開始辦理接管事宜，此時為「接管時期」。一方面由日人造具各項資產清冊，一方面由各接管人員逐步點收。由於當時各會社倉庫容量有限，食糖未按照常規存放，隨意堆積，加上日僑撤退，各人員遣送返國，因人力有限，無法逐一詳細清點，只能暫時以接收清冊做為參考。茲根據1947年9月的「臺灣糖業有限公司接收敵糖之經過報告」¹⁰敘述於後。

抗戰勝利後，政府派員到各敵偽區接收，凡是戰敗國敵方日人所留下來的所有動產與不動產都是所謂的敵產，如土地、房屋、工廠、資金、財物、物資等等，皆由政府人員接收。亦即凡是敵人統治淪陷區所遺留下來的資產，通稱為「敵產」，而所謂「敵糖」，就是敵人所留下來的砂糖，禁止運回日本，應由我方政府全部接收，只是有劃歸中央或地方之分。所以糖業接收人員來臺後，接收多少敵糖是必須初步瞭解的課題。

先是監理人員調查各製糖會社的存糖，根據各會社帳面的結存，截至1945年8

10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糖業有限公司接收敵糖之經過報告〉，《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頁164-169。

月底止，砂糖數量為5,788,102.17臺擔(1臺擔=0.06公噸)，換算為347,286.13公噸，經實際核算扣除重複部分，應為345,090.54公噸。然而自1945年8月至11月底監理期委員會成立以前，由於各會社仍照常配給砂糖，還有出售契約糖或疏開糖回收的損失、酒精原料、社內員工配給物資、營團交貨及樣品糖等等，共付出166,738.532公噸，因此至11月底帳面的存糖為178,351.868公噸，¹¹此即在監理時期以前實際帳面結存砂糖的數目。

在監理時期，雖經回收部分的砂糖，而查出災害損失、社內員工配給、盜竊損失等，計淨付出5,089.632公噸，故至1946年3月底，帳面存糖數目為173,262.235公噸。而後再經初步清查改裝，以及收回疏開糖、契約糖的損失，實際得到存糖為148,176公噸，¹²約為15萬噸，此即所謂接收「十五萬噸敵糖」的由來。（參見表1）

表1：接收敵糖處理表

時 間	存糖量（臺擔）	存糖量（公噸）	備 註
1945年8月底	5,788,102.17臺擔	347,286.130公噸	未扣除鹽糖、明糖
1945年8月底	5,751,509.97臺擔	345,090.54公噸	扣除鹽糖、明糖重複
1945年11月底	2,972,531.13臺擔	178,351.868公噸	扣除配給砂糖、契約糖、災害損失
1946年3月底	2,887,703.92臺擔	173,262.235公噸	扣除配給、損失5089.632公噸
1946年4月	2,469,600.01臺擔	148,176公噸	

（根據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糖業有限公司接收敵糖之經過報告〉，《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頁166製表。）

以下分別就各項處理砂糖情形加以說明。

一、疏開糖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各製糖會社為了避免存糖遭受飛機轟炸，曾將一部分

11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糖業有限公司接收敵糖之經過報告〉，《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頁166。其數字178,351.898公噸有誤，應為178,351.868公噸。

12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糖業有限公司接收敵糖之經過報告〉，《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頁166。其數字148,179公噸有誤，應為148,176公噸。

砂糖疏散寄存於農村民家，此即所謂「疏開糖」。四個製糖會社寄存民間砂糖的數量不少，由數百包至數千包不等，總數為167,842.152公噸，約為17萬公噸。¹³由於民間房屋大多不適合儲藏砂糖，受到風吹日曬潮濕而致漏失情況，十分普遍。

據前臺糖公司農務處長陳明言指出，他家世代為糖廍，其父當時為嘉義大林糖廠附近大湖里保正（里長），故被指定為存放疏開糖之家，他記得砂糖只是用草蓆紮成像豆腐方塊，隨意堆放地上，也無其他覆蓋防潮的設備，存放的條件很差，容易潮濕受損，若用麻袋裝置，那是很高級的，做為出口銷售時才用。這種簡陋存糖方式，也可以由吳尊賢的回憶錄中得到印證。¹⁴

當時存糖倉庫的條件很差，就連製糖所的倉庫也極簡陋。而上述的疏開糖直至監理人員來臺後，才依照清冊逐戶收回。然而這些砂糖堆置已久，加上臺灣光復初期，治安不良，盜竊橫行，經收回改裝清點，損失36,959.432公噸，在接管前已經在帳面上減除15,002.327公噸，接管後清點損失21,957.105公噸。¹⁵故知戰爭的破壞損失相當可觀。

二、契約糖

在日治時期，砂糖即為統制貨品之一，戰爭結束後，日人始於10月8日廢止統制。1945年8月至11月，監理人員抵臺之前，四個製糖株式會社已經與本省商人自由訂立契約，出售大批砂糖。此因一則可以結好於臺胞，一則製糖季節將近，急需現金週轉。實際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備司令部「前進指揮所」已經於10月13日公布臺進字第26號公告「敵產移動進指令」，禁止敵產移動，政府及日籍人民所有的公私財產，所有敵產物資，除商店及正常商業以外禁止轉移、買賣及變更。10月16日，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當即遵照前進指揮所指示的原則，公布附令第138號規定，關於限制私有財產處分辦法，凡是私有動產及不動產之買賣及移動情事，應依照該辦法之規定實行。

13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糖業有限公司接收敵糖之經過報告〉，《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頁168。其數字1,669,042.152公噸有誤，應為167,842.152公噸。

14 吳尊賢，《吳尊賢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4月），頁88。

15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糖業有限公司接收敵糖之經過報告〉，《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頁168。

各會社存糖屬於敵產物資，不能任意銷售，但是各製糖會社卻曲解法令，以為售糖是正常商業行為，將庫存砂糖以及未能回收的疏開糖與商民訂立售糖契約出售，此即所謂之「契約糖」。在12月1日監理開始以前，因訂約而已提糖付款者不少，但已付款或未來得及提糖，或未付款而僅訂約者頗多。

前臺南幫企業家吳尊賢是臺南縣學甲鎮人，他說，戰爭末期1945年7月間，美軍飛機轟炸十分頻繁，大家都躲在防空洞。不過依照當時情勢研判，日軍戰敗，戰爭即將結束，是當時臺灣同胞的共識，臺灣即將回歸祖國，他與父兄商量如何因應戰後的經濟情勢變化，認為「臺灣對外通商斷絕已久，幾年來糖廠所生產之蔗糖幾乎全無出口（戰爭），每個糖廠都堆積如山，價格很低，戰爭結束後，對外通商恢復時，糖價一定會上漲，對此應多留意。」¹⁶所以試圖尋找賣糖的來源，於是去拜訪佳里製糖所松田所長，詢其有何東西可以出售？松田答以遵照上級規定，一切原物料都不能出售，唯有砂糖可以販賣，就派人帶他去幾處堆糖的倉庫查看，他說：

倉庫有牢固的，也有臨時以竹材為骨幹，極簡陋的建築，倉庫內的糖也只有一處是用麻袋裝的，其餘多處是用草袋裝的，而且因為擔心盟機空襲起火，麻袋上全部用沙土覆蓋，只有以麻袋裝的那一所倉庫未用砂土蓋在上面。看完後，我即再去找松田所長，表示要買用麻袋裝的那一倉庫的全部砂糖。當時市面售價每斤舊臺幣約七毛錢，他開價五毛，我認為倉庫內的砂糖因堆存過久，每袋都流出糖汁，以後要出售一定要經過整理，經整理後一定會有減重之損失，於是要他再算便宜一點，他表示不能再低，我就決定買了。¹⁷

在約好買糖的第二天，松田所長告知，另有一批人（據知是全體里長），都要來買糖，經談判結果，他們決定和吳尊賢平分，但每斤降為三毛，他雖不願意，也只好接受。這些砂糖經過改裝，用小型機船運往大陸銷售，確實賺到一筆錢。可見民間當時向糖廠購糖私運販賣，藉機賺上一筆的商人，應該為數不少。

12月1日開始監理以後，負責人員以事關國家利益所在，不容許少數不法商人

16 吳尊賢，〈人生七十〉，《講義雜誌》，1988年3月號，頁108。

17 吳尊賢，《吳尊賢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4月），頁87-88。

獲取非法利益，故即簽准陳儀長官該項契約無效，規定已提糖者追糖，未提者不准再提，並退款了事。¹⁸12月29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備司令部發布署字第772號公告：

凡在臺灣省應為我政府接收之日方一切動產與不動產（包括一切軍需物資、房地產、金銀貨幣、珍珠飾物、股票、債券車輛、船舶、貨物原料、機器等），不准利用各種方法隱匿、逃避、收受、寄藏轉移。各項法令凡屬違法契約，應屬無效。¹⁹

迨至監理人員前往各製糖會社執行職務時，即通知各會社停止提付各項該項契約，各會社大多遵令辦理。

1946年1月9日，糖業監理委員會主任監理委員沈鎮南將此項契約事實簽呈報告陳儀長官，奉批：「此項違背法令之契約，一律無效。」「凡已交貨物，准予退還」。然而當時物價高漲，加上臺灣社會情況特殊，實際上無法遵照政令執行。已付款提糖者，因格於實際困難，無法完全強制收回；而已付款未提糖者，又堅持契約糖已經輾轉讓售他人，其中頗多糾葛，寧可惹出糾紛，也不肯退款了結。

「糖業接管委員會」當局既然負有奉行政府命令的責任，對於各前契約購糖商民不肯敷衍了事。於是各契約購糖商人組成「臺灣砂糖契約受渡履行協會」，欲藉團體力量挽回無效的契約，經先後上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參議會、「清查團」、監察使署等，始終無結果。惟接管當局以國家利益的立場，秉承陳儀長官的意旨，擬出解決辦法。嗣經邀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和參議員林獻堂兩位本省有力人士出面居中協調，並傳達政府對於臺灣省初返祖國，寬大為懷，體恤商民之意。結果契約商民初步同意將契約未繳款領糖部分約20萬擔放棄，於是政府當局、臺糖公司於1946年11月23日約集商民等召開協商會議，解決辦法如下：²⁰

（一）契約一律無效。但已付款而未取糖者，以所繳款項，依照奉批契約無效

18 「契約售糖案簡略經過」（民國36年2月20日），《臺糖公司微縮檔案》，臺糖公司藏，微捲號：1453.318.1，01702-4。

19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糖業有限公司接收敵糖之經過報告〉，《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167。

20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糖業有限公司接收敵糖之經過報告〉，《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167。

之日（1946年1月9日）每臺斤1元3角折付砂糖，以資清點。收繳款項共計325萬元，折合砂糖2萬5千擔，均以分蜜白糖計算。

- （二）砂糖消費稅350萬元，由收貨者負擔。
- （三）收貨人允提出砂糖價值百分之五充介壽館捐款。
- （四）未繳款未取糖者，為示政府寬大，均免追究。
- （五）已取去之糖超過所付款者約3萬擔，應追回物款，或依法起訴。本項辦法並由臺糖公司於1946年11月25日簽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核示，經奉批照辦。

綜計契約糖在監理前已經付出砂糖951,626.45臺擔，作廢契約糖658,138.213臺擔，減除交糖損失292,423臺擔，共計1,609,472.24臺擔，折合為96,568.334公噸。而簽呈批准後折付償還已付款補發糖計為1,484.92公噸。

前述吳尊賢回憶向佳里糖廠買糖，就是在監理人員來臺監理之前簽訂售糖契約。陳明言說他親眼目睹有偷盜糖廠砂糖從三條崙海邊走私運到日本銷售，凡此都是臺灣光復後砂糖數量銳減的原因。

三、各項配給糖與原料糖

除了上述契約糖和疏開糖之外，還有各項配給糖和原料糖的支出：

- （一）配給糖：依照日人慣例，由各會社配售給各社會團體之食糖，有戶口配給糖、駐臺軍隊及軍事機關配給糖、定量配給之加工糖。
- （二）消費糖：配給各會社員工及會社本身消耗之砂糖。
- （三）軍納：贈送各部隊之食糖。
- （四）原料糖：製造酒精原料所用之糖。

此外，還有「物資營團」²¹及「貿易局」的訂購糖。「日本糖業聯合會臺灣支部」與「物資營團」訂立契約共89,931.50臺擔（5,395.89公噸）。在1945年8月前

21 「物資營團」全名「臺灣重要物資營團」，為日治時期半官商貿易機構之一，設立於1944年3月，其業務為嚴格統制貿易並直接經營，或以委託方式辦理進出口業務。臺灣光復後，與其他被接收七個單位合組成「臺灣貿易公司」。（參見薛月順，〈陳儀主政下「臺灣省貿易局的興衰」〉，頁197-198。）

計提出15,031.50臺擔（901.89公噸），8月至11月陸續提出47,496臺擔（2,849.76公噸），尚欠27,403.50臺擔（1,644.21公噸），這些砂糖後來都由臺灣省貿易局接收繼承。其他還有庫存砂糖因被炸、濕漏、燒壞及其他零星損失。

以上為臺灣光復後，政府接收日人留下敵糖的概況。糖業接管委員會成立後，正式接收這批約15萬噸的敵糖，而這些敵糖究竟應該歸屬中央或臺灣省地方，法令並無明確規定。根據史料記載，最後由行政院下令歸屬中央（參見第參節），並由臺糖公司代運至上海代售，所得均歸國庫，詎料此15萬噸糖日後竟成為228事件發生的民怨之一，恐為政府當局所始料未及。以下將先敘述光復後臺灣砂糖生產及銷售狀況，再分析何以中央與地方爭相接收這批15萬噸敵糖，以及由中央接收後何以會發生嚴重後果。

叁、光復後臺糖的銷售情形

臺灣省行政長公署於1945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運作後，也開始對於日產做接收清理的工作。所謂日產，就是日本人在臺灣的財產，可分為三類：（一）公有財產：即臺灣總督府所屬機關的財產。（二）企業財產：即包括公有、私有資本的企業，均劃歸為日資企業，如糖業株式會社、海軍第六燃料廠（煉油廠）。（三）私有財產：即日人私有的動產和不動產。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1945年11月初開始接收日資企業，由經濟部資源委員會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合作協調，最後成立十大企業，其中資源委員會獨資經營石油、鋁業、金銅礦三大產業，國省合營為糖業、電力、肥料、機械、造船、碱業、造紙等事業。在日產的處理上，雖然行政院在法令上掌握處理日產的決定權，但擬定處理的原則主要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實際上，行政院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間缺乏明確的權責劃分。以糖業為例，是由經濟部臺灣區特派員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工礦處主導，特派員和工礦處長都是資源委員會的工業處長包可永，先是成立「糖業監理委員會」，而對於戰後日本留存砂糖的接收和銷售，則掌控於臺灣省貿易局的手中。及至1946年4月「接管委員會」成立後，正式接管日本四大糖業株式會社，最後決定由資源委員會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合辦臺灣糖業股份公司，雙

方股份是6比4，此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於砂糖的掌控權便無形中被削弱，臺糖公司生產的砂糖大多直接運銷內地或在臺灣本地銷售，並不須經由臺灣省貿易局，就連臺灣省貿易局最初計畫接收銷售各會社的日本存糖——「敵糖」，也因行政院長宋子文電令「將糖業接管委員會接收各製糖會社存糖二十萬噸運往國內供應」，²²以致5月的工作計畫只是協助裝運食糖，不再有售糖的計畫。

以下分別就臺灣省貿易局和臺糖公司的售糖情形加以敘述。

一、臺灣省貿易局

臺灣光復初期，砂糖的銷售，包括內銷或外銷，主要是由臺灣省貿易局主導。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貿易局原名「臺灣省貿易公司」，成立於1945年11月5日，至次年2月11日改名「臺灣省貿易局」，於1947年5月30日撤銷。臺灣省貿易公司是接收日人在臺的官商貿易機構接收而來，計有：臺灣重要物資營團、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三菱商事株式會社、南興公司、菊元商行、臺灣纖維製品統制株式會社、臺灣織物雜貨卸賣組合、臺灣貿易振興會社等八個單位，其主要目的在於統籌物資的進出口及配銷業務，如米、糖、茶葉、樟腦、麵粉、肥料、布匹等等。工作業務包括：

- 1.進出口：進口工業用品原料，出口本省特產品，如糖、樟腦、茶等。
- 2.配銷物資：配銷的物資來源包括接收的日產物資，如接收各單位的糖、鳳梨罐頭、茶葉等；代購收購物資，如向民間收購食糖，查獲私糖予以收購。

3.交換物資：例如以臺灣的糖和煤交換大陸的肥料。根據臺灣省貿易局的組織規程，其成立主旨為「統籌調劑物資供需，藉以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經濟建設，辦理指定物資之進口出口及其配銷事項」，²³亦即是壟斷物資，統制貿易。然而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而言，臺灣省貿易局可以增加臺灣省財政收入，掌控臺灣的原料物資，不使商人囤積居奇，有利於經濟建設。

22 薛月順編，〈臺灣省貿易局三十五年五月第三週工作報告（5月15日）〉，《臺灣省貿易局史料》，第1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2年6月），頁57。

23 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三）》（臺北：國史館，民國88年2月），頁272。

由於戰後砂糖產量不多，所以砂糖價格上漲，成為各方爭取的重要物資。臺灣光復後，物資缺乏，生產萎縮，唯一可用以換取錢幣的只有砂糖，而此砂糖就是日人存留在會社和民間的糖。據臺灣省貿易局長于百溪的回憶，剛來臺灣時，到處是糖，而售價僅及上海的十分之一，利之所在，暗中偷運糖出口者，比比皆是。陳儀見此狀況，為了禁止走私運糖至他處販售，就和他商量，由臺灣省貿易局掛牌收購食糖，逐漸降低牌價，使走私商無利可圖，偷運者自然日減，而一般存糖戶見糖價下跌必然前來投售，如此就可把散存在民間的食糖全部收購。這個措施實行的結果，雖然達到上述目的，但卻使糖價逐漸上揚，連帶引起物價飛漲。²⁴對人民而言，卻是統制經濟下的殖民地性掠奪。王思翔的〈臺灣二月革命記〉如此敘述：

以臺糖為例，今春臺灣糖價每斤170元臺幣，而政府發行臺幣收購臺糖輸出上海，卻只售130元，這就是典型殖民地剝削。他們又不顧成本，強制壓低臺灣產品價格，因此在輸出中攫取鉅額利潤。²⁵

政府單位以低價收購砂糖，高價賣出，人民當然怨聲載道，這也是228事件之後，臺灣省貿易局被撤銷的原因。

除此之外，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又制定法令，禁止人民將砂糖私運出口，由臺灣省貿易局統籌銷售。臺灣省貿易局不僅接收敵糖，還收購、銷售食糖，壟斷砂糖物資的流通。

1945年12月初，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發布公告，頒布查禁食糖私運出省辦法，明令禁止人民私運食糖出口，其主要目的在於以臺糖換取肥料。陳儀曾對外說明：

臺省糧食之增產，其要諦端賴肥料之輸入，為謀肥料之輸入獲得，必須集中碩果僅存的食糖，以資交換，本省發佈臺糖出口禁令，其根本要義即在於此。……為普遍獎勵一般肥料之供應起見，所有任何方面或任何商人，運載硫安或大豆餅到臺者，均可向本省貿易公司換取食糖出省。²⁶

24 于百溪，〈陳儀治臺的經濟措施〉，《二二八研究三集》（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2月），頁174-175。

25 王思翔，〈臺灣二月革命記〉，《臺灣舊事》（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5年2月），頁193。

26 〈肥料換食糖〉，《臺灣新生報》，1945年12月26日，版2。薛月順，《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第3冊，頁239-242。

1946年1月22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向「糖業監理委員會」發出訓令，再次申明不可出售存糖，以防範走私：

查食糖現為本省重要物資，業經明令禁止私運出省，分別公告通令查緝各在案。……又為防範走私起見，以後各會社存糖，非報經本公署許可，不得出售。併希轉飭遵辦據報為要。此令。行政長官陳儀。²⁷

陳儀希望藉由臺灣省貿易局完全掌控食糖的生產狀況和銷售出口，以斷絕民間私運獲取暴利。有關臺灣省貿易局接收食糖及銷售狀況，從臺灣省貿易局的檔案「週報告」、「工作報告」即可得知。²⁸如1946年4月第三週（4月17日）報告：

本省各製糖會社所有存糖，奉宋院長電，趕運基隆集中，刻已決定由「糖業委員會」逕行集中，運交上海「（敵偽產業）處理局」。又本局自行收購部分，亦加緊集中基隆，待運出口交換物資。²⁹

1946年5月第三週（5月15日）的工作報告「實施情形」如下：

宋院長電令將「糖業接管委員會」接收各製糖會社存糖20萬噸運往國內供應，已由「糖業接管委員會」加緊運集交裝中。昨因滬輪續到，集中不及，本局特將由部購入存糖項下撥借。³⁰

可知5月15日前，因行政院長宋子文電令運糖至滬，臺灣省貿易局奉命集中運糖，因恐來不及，於14日先將購來之糖撥借。

又這年6月第一週報告：「本省現因需肥料至急，正簽請電商宋院長賜撥中，所需價款，擬由本省運交中央食糖價款項下撥抵。」³¹因臺灣省急需肥料，臺灣省

27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訓令糖業監理委員會」（民國35年1月22日），《臺糖公司數位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40-35-023.12-1，微縮號：35-31-1463-2023，原微捲號：1463。

28 薛月順編，〈臺灣省貿易局三十五年一月第二週工作報告（1月2日）〉，《臺灣省貿易局史料》，第1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2年6月），頁44。

29 薛月順編，〈臺灣省貿易局三十五年五月第三週工作報告（5月15日）〉，《臺灣省貿易局史料》，第1冊，頁48-52。

30 薛月順編，〈臺灣省貿易局三十五年五月第三週工作報告（5月15日）〉，《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第1冊，頁57。

31 薛月順編，〈臺灣省貿易局三十五年五月第三週工作報告（6月5日）〉，《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第1冊，頁62。

貿易局希望可以從運給中央的食糖售款中抵扣肥料的價款，可見臺灣省財政支絀，非常需要這筆敵糖的售款。

在臺灣省貿易局1946年度上半年工作報告中，出口物資「食糖」一項，預計出口18萬公噸。計畫要點內容如下：

食糖18萬噸，供給：糖廠存糖186,000噸，民間存糖66,000公噸，產糖90,000噸，共計342,000噸。需要：省內消費60,000噸，酒精原料60,000噸，存儲42,000噸，共計162,000噸。³²

但是上半年實際只出口8,017公噸，並未能按照其計畫進行，其原因為何？在備註欄說明如下：「因本省接收糖嗣由中央接運，致預定進度未實現」。此接收糖就是所謂的「敵糖」，這些糖後來被行政院指定為中央所有，所以臺灣省貿易局無法進行出口售糖。

根據臺灣省貿易局1946年度工作報告中，食糖出口的紀錄可知，這一年輸出糖數量，一年中計運出食糖10,429.8噸，其中上海為7,500噸，占80%，天津為1,700噸，成都為47.8噸。³³

臺灣省貿易局1946年度工作報告中，「出口物資」項下有「工作困難及改進意見」欄，內容如下：

本局35年度工作計畫之所以與實施概況未能盡相吻合者，其主要原因茲臚陳如左。糖：本局計畫時，臺糖公司尚未成立，及至成立後，臺糖輸出由該公司直接辦理。且本省存糖，中央按規定敵產處理，且須儘先運出，使本局未能大量出口食糖。³⁴

臺灣省貿易局原計劃在1946年度可以出口18萬噸糖，因當時臺糖公司尚未成立，全省所有砂糖銷售都掌控於臺灣省貿易局手中。及至是年4月中，「糖業接管委員會」成立，開始接管敵糖資產，5月1日臺糖公司成立，有關臺糖的輸出改由臺

32 薛月順編，〈臺灣省貿易局三十五年度上半年度工作報告〉，《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第1冊，頁217-218。

33 薛月順編，〈臺灣省貿易局三十五年度工作報告〉，《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第1冊，頁247-248。

34 薛月順編，〈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第1冊，頁247-248。

糖公司直接處理，不須假手臺灣省貿易局。而臺灣省貿易局4月17日的工作報告，已有「宋院長電令，中央接收臺省存留的日本砂糖，將敵糖以敵產歸政府所有」的紀錄，以致臺灣省貿易局無法大量出口食糖，一年中只出口1萬多公噸，計畫與執行的結果落差太大。臺灣省貿易局既然無法插手行政院敵糖出口，所以「查禁食糖私運出省辦法」的禁令至1946年8月就宣告取消。

1946年8月30日，工礦處代電答覆清查團接收敵人存糖及處理情形如下：

前項被日人非法出售之糖業經明令宣告無效，已收款項者亦均予退還。

近因糖價高漲，商民未能獲得暴利，因此不無怨望，曾多方運動請願。

惟本處因該項舊糖所有權屬中央，自應遵令堅決執行。³⁵……

不過，臺灣省貿易局所運出的糖，並不一定是製糖會社的存糖。臺灣省貿易局出口的食糖大多是接收來自其他機關單位，如軍政部、警備部移交的糖，還有向民間收購的食糖，只有少數才是行政院委託外運的存糖。

總之，日本各會社的砂糖先後由糖業監理委員會和糖業接管委員會接收，除了早期少數委由臺灣省貿易局運糖至上海以外，及至臺糖公司於1946年5月成立以後，大多由臺糖公司與糖業接管委員會直接經基隆或高雄運往上海出售，並不經由臺灣省貿易局處理。由上引臺灣省貿易局工作報告「本省存糖，中央按規定敵產處理」，「宋院長電令將糖業接管委員會接收各製糖會社存糖二十萬噸運往國內供應」，已可證實敵糖歸行政院，乃是按照中央規定處理，並不是陳儀自動奉送15萬噸敵糖給中央。

二、臺糖公司

「糖業監理委員會」於1946年2月28日奉令改設「糖業接管委員會」，下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區四個區分會，分別管轄34個糖廠（原稱製糖所），沈鎮南於3月25日奉派為主任委員，開始接收各製糖株式會社的資產、清冊、物資，而此時接收的存糖148,176公噸，就是所謂15萬噸敵糖的確實數目。

1946年4月12日，「糖業接管委員會」函臺灣省貿易局商討中央所需食糖運滬

35 「工礦處代電清查團」（民國35年8月30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案號：261500350047。

問題：

奉長官條諭：「現因中央需要食糖，本省之糖自本月十五日起，每日在基隆、高雄兩港口集中五百噸以備運滬，即由工礦處、交通處、貿易局協同辦理」等因。奉此經包處長批交「糖業接管委員會」召集協商辦理。茲定於本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在撫臺街（大和町）「糖業接管委員會」開會商討。³⁶

由上述資料可知，宋子文院長大約是在4月上旬發出將敵糖運中央的電令，此時糖業接管委員會已經成立，並接收各會社資產清冊，於是自4月15日起將砂糖集中港口，5月開始在上海售糖。

1946年6月16日，臺糖公司召開第一次公司會議，由總經理沈鎮南主持，出席人員為各區分公司經理張季熙、吳卓、陸寶愈，以及各廠廠長等32人，從沈鎮南於開幕致詞中報告公司財務及業務狀況，可瞭解臺糖公司當時售糖狀況。

沈鎮南首先報告財務問題，在開支方面，至1947年年底全部共約需24億元。在業務方面：

自1945年12月1日監理開始，即通知各會社全部停止售糖。當時因情況十分紊亂，契約糖與疏開糖極待清理，故省內決定停止銷售。省外銷售市場主要在上海，由總公司辦理。

收入方面如下：

15萬噸存糖係中央沒收敵產，非本公司所有，無權處理。有權處理者，僅新糖86,000噸，估計每噸24,000元，約可值20億元，還需運費、稅項等支付，故收支相差還大，還要想辦法使這差額彌補。此外，尚須辦理蔗農貸款、肥料貸款，以及本身農場植蔗費用。

由沈鎮南的報告可知，當時臺灣的砂糖，自監理時期起即停止銷售，至於敵糖15萬噸歸屬中央，臺糖公司根本無權過問，只能依靠新糖銷售所得。為了改善公司的財務，沈鎮南曾向行政院長宋子文請求同時准許公司在上海賣新糖，否則請求貸

36 見「糖業接管委員會函貿易局」（民國35年4月12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糖接字第9號。

款以維持生產，但都被宋院長駁回，理由是違背政府的「收縮通貨政策」：

因本公司財務關係，本人曾往行政院請求同時准許本公司在上海賣糖，否則請求貸給款項維持生產。當時宋先生復告：政府存糖委託本公司在上海發售，實係「收縮通貨」之一種工具，故如本公司新糖同時出售，勢必影響收縮通貨的政策。但本公司為同人家用匯款以及總公司開支，需要一部份國幣，經多方請求，始允在銷售糖類之中，依七比一之比例，即銷糖8噸中7噸作為行政院銷糖，1噸為本公司銷糖。現上海方面已開始售糖，供不應求。預計每月可有2,000萬（元）臺幣收入。現上海售價每市斤國幣約660元，內中尚須扣除稅捐運費，每斤約160元，故每斤淨收入約500元。³⁷

臺糖公司既不能銷售敵糖，也不能在上海銷售新糖，如此臺糖的重建經費及開支從何而來？沈鎮南言下充滿無奈，他只好再三表示臺糖公司的財政困難與需要，請求能予以通融，宋院長才同意在銷售糖之中，依七比一的比例，銷糖8噸中7噸作為行政院銷糖，1噸為該公司銷糖，這樣臺糖公司每月還可有2,000萬元臺幣收入，也算聊勝於無。

按臺糖公司自成立以來，因各糖廠急待重建復舊，更新機器設備，所需資本支出頗鉅，而政府並未撥發專款，以是所有興建經費均需公司自行籌措。加上甘蔗種植時間長達一年半，因而積壓週轉資金數額更多，完全依賴臺灣銀行借款，財務十分拮据，監理期間即結欠臺銀3億700萬元臺幣，至1946年底借款又增至20億元。³⁸早在公司未成立前，資源委員會即多次要求將敵糖全數歸糖公司所有，以存糖出售收入維持公司業務。³⁹此時臺糖公司既已經生產新糖又不准售糖，而要求其能自給自足，實屬強人所難，十分不合理。但該公司既為公營事業，亦不得不遵令奉行。

自1946年4月起，臺糖公司開始運糖至上海銷售，以上海為全國食糖集散地，

37 〈臺灣糖業公司第一次會議〉（民國35年6月16日），《臺糖公司微捲檔案》，臺糖公司藏，微捲號：1463.309.1。

38 張季熙，《臺灣糖業復興史》（臺北：中國工程師學會，1958年），頁100。

39 鄭友揆、程麟蓀，《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頁223。

在此設立辦事處，專辦臺糖銷售事務。該公司奉令在上海實施配售食糖，決定營業三大方針：（一）採用躉售方式，不予零售。（二）定價必低於市價。（三）對大量直接消費用戶，直接配售。⁴⁰結果上海的糖價較其他物價最為穩定。此對於供應全國食糖市場消費需求，使通貨回籠，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協助政府平抑物價，影響國計民生，貢獻頗大。⁴¹當時砂糖多先自各廠提運，再轉鐵路集中基隆港口運滬。

「糖業接管委員會」5月份業務報告如下：「本月份主要業務為趕運砂糖至滬銷售，計運及基隆之砂糖共8,800公噸，分裝輪船三載，共運出6,000公噸，約合臺幣7,300,000元。」6月份業務報告：「本月份運集基隆之砂糖約8,000公噸，裝船運滬7,000公噸，售出酒精580,756公噸，約值940萬元臺幣。」⁴²

1946年自4月至8月底，臺糖公司計向中央輸出砂糖891,265.50臺擔，折合為53,475.9公噸，存糖為1,760,704.77臺擔，折合為105,642.286公噸。⁴³至11月底，共輸出88,485.63公噸。⁴⁴是年在上海共銷售97,985公噸。⁴⁵

臺糖公司由於面臨財政困難問題，十分嚴重，曾於1946年9月初呈請行政院准從敵糖售款中撥還2億元以便償還臺灣銀行欠款，並希望每月撥食糖3,000公噸以資補貼。行政院於9月12日指令資源委員會，告以「敵糖售款收入係屬庫款」，所請無法照准，令文如下：

呈為臺糖公司維持困難，請將接收前所欠臺灣銀行貳億元，准由敵糖售款內撥還，並請月撥食糖3,000噸以售價補貼該公司由。呈悉。查國營事業最低限度應求自給自足，不應動請補貼。至敵糖售款收入係屬庫款，

40 張季熙，《臺灣糖業復興史》（臺北：中國工程師學會，1958年），頁97。

41 臺糖公司經濟研究室，〈光復以來之臺灣糖業〉，《臺灣糖業季刊》，創刊號（臺北：臺糖公司，民國36年10月1日），頁239。

42 「糖業接管委員會五月份業務報告」，《臺糖公司數位化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40-35-023.1，35-31-1463-1389~1391，1394，原微捲號：1463。

43 臺糖公司，《臺灣糖業概況》（臺北：臺糖公司，1946年12月），頁38，及見「臺灣糖業接管委員會接收舊糖及處理情形」表。

44 臺糖公司，《臺灣糖業概況》，頁70。參見「由基隆出口運滬砂糖數量表」。

45 臺糖公司，〈臺灣糖業公司三年來工作紀要〉，《臺糖公司微縮檔案》，臺糖公司藏，微捲號：1403.437.1。

所請動支該項售價之款清償前欠款，未便照准，仰即知照。此令。⁴⁶

資源委員會王舜緒對此指令簽註意見如下：

（一）臺糖請撥2億元歸償接收前欠款，即奉行政院批示不准，祇（能）由公司收入項下設法籌還。（二）該公司請月撥敵糖3,000噸藉資補貼一節，據悉該公司曾呈准宋院長每次出售敵糖，其中8分之1為公司售糖。目前既有收入，自無需再請津貼。⁴⁷

資源委員會遂於9月27日訓令臺糖公司，轉呈行政院核示。⁴⁸

由上引資料可知，臺糖公司因財務缺乏資金週轉，故向行政院請求由敵糖售款內「撥還」，並請月撥3,000噸食糖以售價補貼，但行政院認為國營事業應該自給自足，不應動請補貼。而資源委員會認為既然臺糖公司每月還有八分之一的收入，可以充當補貼，也就作罷，訓令臺糖公司遵行，勿再提出動支敵糖售款或呈請補貼的要求。

臺糖公司1946年度的售糖數量（當時只有內銷），臺灣自11月份才開始配售，共計36,666公噸，運至上海為97,985.64公噸，各月運滬的數量如下（見表2）：⁴⁹

46 「行政院指令資源委員會」（民國35年9月12日發，第6990號），《資源委員會檔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案卷號：8194。

47 「王舜緒簽註意見」（民國35年9月16日），《資源委員會檔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案卷號：8194。

48 「資源委員會訓令臺糖公司」（民國35年9月27日），《資源委員會檔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案卷號：8194。

49 「臺灣糖業公司三十五年度業務年報」，《資源委員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函號 24-20-02，宗號32-（1）。

表2：運滬砂糖數量表

月 別	噸 數
五月	6,000
六月	7,000
七月	6,200
八月	16,843.61
九月	21,689.6
十月	18,432.39
十一月	12,320.03
十二月	9,500.01
計	97,985.64

上海售出食糖45,925公噸，獲法幣966億元。⁵⁰1947年度臺灣銷售15,971.54公噸，上海107,795公噸，合計123,766.54公噸，外銷香港550公噸，馬來亞800公噸，總計為125,116.54公噸，兩年內外銷共計259,768.18公噸。⁵¹以這兩年的產量來看，1945/1946年度產糖86,074公噸，1946/1947年度生產32,936公噸，兩年合計為116,967公噸，銷售量遠超過生產量，可知敵糖的銷售必然包括在內。

根據上引臺灣省貿易局和臺糖公司的檔案史料，所謂送給中央的15萬噸糖，確有其事，而且是奉行政院長宋子文的指示辦理。那麼行政院（中央）何以一定要取得這批敵糖？從沈鎮南在第一次公司會議的報告可知，宋子文的理由是中央的「收縮通貨政策」，地方政府自然應該遵照辦理，臺糖公司是直屬行政院經濟部的機構，當然也不能違抗中央的命令。而且銷售的糖款收歸國庫，臺糖公司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都無法分一杯羹，因為沈鎮南力爭，臺糖公司後來才獲得宋院長的特准，可以取得8分之1的售款，以及少許的管理費、運費。

所謂「收縮通貨政策」，就是在面臨通貨膨脹時，出售物資，收回過多的通貨，以減少通貨的流行，是解決通貨膨脹的方法之一。例如美援時期，我方出售美

50 「臺灣糖業公司三十五年度業務年報」，《資源委員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函號 24-20-02，宗號32-（1）。

51 參考《臺灣糖業公司概況》（圖表），臺糖公司印行，民國40年9月。

援物資必須有相對資金的存款，也是收縮通貨的方法。15萬噸糖是一筆為數可觀的售款收入，其價值多少？以時價每噸400美元計算，價值6,000萬美元（約折合臺幣13.26億元）。⁵²臺糖公司若能獲得這筆款項，就不必大量向臺灣銀行借款，間接減少臺灣的通貨膨脹。《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實與評析》一書，直接點出宋子文院長之所以將這批糖劃歸中央，主要原因是戰後國內（大陸內地）已經物價高漲，出現嚴重的通膨現象，宋院長正在謀求大量輸入物資以平抑物價之際，對於這筆鉅額的資財，當然不會輕易放棄此一可以藉賣糖增加政府收入，又可減緩通貨膨脹的好機會，於是強令將這15萬噸糖全部劃歸中央政府所有，由臺糖公司代為運至上海銷售，所得收入得以全部繳庫。⁵³

然而行政院何以不准臺糖公司在上海銷售新糖，以免妨礙「收縮通貨政策」？分析其原因，其一，因為糖量供應增加，必會導致糖價下跌，減少通貨的回收；其二、新糖售價必然高於舊糖糖價，如此將違背降低物價的原意；其三，臺糖公司售糖糖款歸公司收入，售款所得法幣又必須兌換成臺幣，轉匯至臺灣銀行，又發生匯差問題。然而此一政策給臺灣人民留下中央不顧地方死活的惡感，認為中央搶了地方的財產，因而激起民怨，228事件的發生其來有自。

至於臺糖公司方面的立場，因日本存糖是臺灣所生產，當然應歸地方所有，而且公司初設，財務十分困難嚴峻，非常需要這筆糖款做為重建的業務經費，若歸中央，則公司一無所有。臺糖公司所需鉅額修復及經營資金，只好靠借款維持經營，對於臺糖公司和臺灣經濟都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肆、敵糖與法幣的關係

根據本文第叁節的分析，可知1946年4月間，行政院下令將臺灣從日本接收的15萬噸敵糖劃歸中央所有，而且指令臺糖公司代運代銷。但是李敖的「笑傲江湖」

52 鄭友揆、程麟蓀，《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實與評析》（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5月），頁223。

53 鄭友揆、程麟蓀，《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頁223。

節目「李敖有話說」，卻說是因為陳儀為了阻止法幣在臺灣流通，使大陸的嚴重通貨膨脹不至於波及臺灣，仍由臺灣銀行發行臺幣，故而以15萬噸糖做為交換條件，而減緩臺灣的通貨膨脹。茲摘錄如下：

那個時候，陳儀為了保護臺灣，就把這個臺幣，新臺幣（按即舊臺幣），不跟海峽對岸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地區的法幣掛鉤，換句話說，法幣在貶值，新臺幣沒有跟它貶值。那蔣介石不肯啊，怎麼辦呢？陳儀就主張臺灣金融要脫離中央的體系。大陸派的銀行來了，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四大國家銀行，與全國菸酒稅局的接收人員。幹什麼？陳儀要他們返回中央。用什麼條件呢？用陳儀給他們10萬噸的臺糖，臺灣的糖，來補助中央的財政，作為交換條件。就是啊，你們大陸的銀行，四大銀行不要來臺灣，為什麼？保護臺灣的經濟穩定，條件呢？我給你們10萬噸的糖來補償政府，政府像強盜一樣，中央政府跟強盜一樣。……⁵⁴

李敖的說法是根據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的回憶錄——〈陳儀先生其人其事〉而來。⁵⁵在柯遠芬所撰〈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像〉一文中也有同樣的敘述：

……陳長官盱衡局勢，為保障臺灣同胞的經濟利益，乃決定建議中央，臺灣的財政機構由地方政府統一接收，並建議法幣勿在臺灣行使，而要求臺幣繼續發行，與法幣照市場價格兌換，幾經商討交涉，始獲中央認可，而臺灣經濟亦因此未受大陸經濟崩潰的影響，保全了臺灣同胞的經濟利益。而其中尚有一交換條件，即臺灣以接收的臺糖10萬噸（按：柯氏口述為15萬噸）呈獻中央，以補助中央困難的經濟。為此事上海大公報（左傾）曾造謠，說是臺灣長官走私臺糖10萬噸，陳長官竟蒙了不白之冤。⁵⁶

54 〈炒作悲情 竄改歷史〉（1月10日），《李敖有話說》，第221集。

見<http://creazywang.bookse.net/talk/221/221.htm>

55 同〈炒作悲情 竄改歷史〉（1月10日），《李敖有話說》，第221集。

56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像〉，《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2月），頁573。

柯遠芬的回憶錄中特別說明，陳儀為了使法幣不在臺灣流通，用15萬噸糖做為交換條件以補償中央，此一說法，頗有可商榷之處，即陳儀是否確實曾以此做為條件？而陳儀是否必須以15萬噸敵糖才可以阻止法幣來臺？對於這些問題，筆者試圖從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行政院檔案、財政部檔案中查證，是否有陳儀提出以15萬噸糖作為補償的公文，卻一無所獲。反而是從行政院、財政部的檔案中，雙方為了法幣在臺灣流通與否的公文往來頻繁，由此可見法幣不來臺灣發行、中央銀行等四大銀行不來臺灣設立分行、由臺灣銀行自行發行臺幣，皆是出自陳儀的主張。除了檔案之外，再從臺灣行政長官的權限、陳儀的禁運私糖政策、宋子文電令接收敵糖的時間、法幣確定不來的時間等交叉印證，亦足以證明陳儀阻止法幣在臺灣流通與15萬噸糖並無關係。本節主旨即在於證明陳儀以15萬噸糖做為法幣不來臺的交換補償說法是錯誤的，亦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一、從法幣到臺幣

自抗日戰爭結束後，大陸開始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光復後的臺灣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一環，自然會受到大陸的影響，同樣形成惡性通貨膨脹。抗戰期間通貨膨脹已經相當嚴重，1942年至1945年間，法幣對美元匯率高漲，從1：100漲為1：6455。⁵⁷

臺灣物價在二次大戰期間，由於日本在戰爭上仍獲優勢，臺灣經濟因支援戰爭，在軍需生產大量擴充之下，加上高壓的物價管制措施，物價雖已上揚，但尚未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及至1943年以後，則因戰爭情況劇變，物價上升有如脫韁野馬。其原因如下：

- （一）戰爭擴大，軍需浩繁，民需生產被挪為軍用，以致民生必需品缺乏。
- （二）盟軍轟炸和海上封鎖，生產設施大部分被摧毀，生產銳減。
- （三）物價管制措施失靈，人心浮動。

日治時期臺灣通貨的發行權是臺灣銀行，發行臺灣銀行券。戰爭前發行額為7,500萬圓，至日本投降前，發行總額約為14億圓，膨脹已達18倍之多，1945年8月

57 潘志奇，《光復初期臺灣通貨膨脹分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4月），頁6。

15日投降後，藉口復員，又大量發行千元大鈔，至10月高達約29億圓。⁵⁸

1945年9月，曾任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的鹽見俊二攜帶大量日本銀行印刷的臺幣，搭乘專機抵臺發給在臺的日本官吏薪水，並預付至翌年3月的退休金，使得在臺日人持有充分的貨幣，有能力採購市場已經匱乏的米糧等各項物資，遂使臺灣通貨膨脹更加激烈。⁵⁹10月中，竟然出現臺灣人購買力減退，日本人購買力反增的怪現象。在1946年1月的「臺灣現狀報告書」中，提及日人使用臺幣在市場收購物品，「因而刺激黑市市場物價，最近物價飛漲，乃日人手中之臺幣無法控制所造成之後果」。⁶⁰

自1946年至1949年6月15日期間，臺灣施行的幣制，並非大陸的國幣—法幣，而是獨立的通貨—臺幣，通稱「舊臺幣」，同時法幣不准在臺灣流通，其主要原因就是為了避免臺灣受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建立所謂的防波堤。此一政策究竟由何人決定？此時臺灣的主政者為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他決定在臺灣實行獨立的銀行貨幣體系，以解決臺灣的金融危機。茲將其決策過程略述於後。

抗戰勝利後，我國大陸地區日本敵偽的金融機構都由國民政府的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等四家銀行以及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分別接收。臺灣的金融機構在日據時期共有七家銀行、一家產業金庫、一家信託會社、信用組合農業會約400餘單位，主要通行貨幣為「臺灣銀行兌換券」。對此狀況，當時財政部也想加以統一處理。

財政部認為，「臺灣淪陷較久，地方情形較為特殊，復員期間，金融方面各項措施應適應當地環境，以免過渡期間的過度更張，影響人民生活。」⁶¹所以在日本投降以前，已經擬具「光復臺灣金融部門應行準備急要事項」六項辦法。該事項

58 鹽見俊二，《祕錄·終戰前後的臺灣》，財團法人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臺北：文英堂出版社，2001年11月），頁19-25、44。轉引自戚嘉林，《臺灣二二八大揭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年2月），頁34。

59 鹽見俊二，《祕錄·終戰前後的臺灣》，頁19-25、44。轉引自戚嘉林，《臺灣二二八大揭密》，頁34。

60 陳興唐主編，〈臺灣現狀報告書〉，《臺灣二二八事件史料（上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年2月），頁51。

61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24。

主要規定：（一）盟軍及國軍在臺灣所需軍政費用概以中央銀行發行之臺灣地名支付；（二）其收發及匯兌事項，應由中央銀行派遣隨軍人員辦理。日本投降以後，臺灣接收工作已經開始，上述辦法業已呈奉行政院核準備案，即商洽中央銀行籌印臺灣流通券，財政部金融接收人員業已準備出發前往臺灣。

1945年10月下旬，財政部頒布「臺灣省當地銀行鈔票及金融機關處理辦法」，規定：（一）臺灣省的銀行鈔票，由政府分別面額，定價分期收換。（二）其定價及收換期間，由財政部公告。（三）臺省內日人設立的金融機關，由政府指定國家行局清理接收。10月25日，財政部制定公布施行中央銀行臺灣流通券發行辦法，以及臺灣省匯兌管理辦法，並於10月31日呈報行政院備案。中央銀行臺灣流通券發行辦法的內容大要如下：

（一）政府為適應臺灣省人民生活，安定市面起見，特由中央銀行發行「臺灣流通券」。

（二）中央銀行流通券為臺灣省境內之法幣，凡臺灣省境內完納賦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均使用之。

（三）中央銀行臺灣流通券分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種。

臺灣省匯兌管理辦法的內容大要為「內地與臺灣之匯款，均應先向中央銀行申請，經核准後發給准匯通知書，再持向中央銀行或其委託之銀行結匯。」規定除中央銀行或其委託之銀行外，其他銀行一概不得經營臺灣省與內地間之匯兌，或中央銀行臺灣流通券與法幣之兌換業務。⁶²

嗣後，中央銀行受財政部之託，預定於11月內在上海趕印26億元「臺灣流通券」，以備赴臺的軍政機關使用和兌換臺灣銀行鈔票之需，並遴派人員準備赴臺設立分行。然而陳儀卻在此時提出反對法幣流通臺灣的意見。

原來陳儀赴臺之前，曾在上海與宋子文院長、翁文灝副院長等商議臺灣的金融問題，主張「臺灣貨幣金融暫維現狀，中央銀行在臺設行，為期尚早」，同時並表示：「臺灣貨幣應由臺灣銀行繼續發行，如中央不予贊同，則當商請中央銀行委託

62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22-423。

臺灣銀行發行，由中央銀行派人監督」。⁶³希望中央暫不插手臺灣的金融，不要在臺灣設置中央銀行，發行法幣，最好是由臺灣銀行發行臺灣的貨幣，或是由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發行亦可。而關於「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發行貨幣辦法」，據陳儀說，在重慶時曾與財政部長俞鴻鈞面談提出，而於10月29日以豔電請俞部長轉陳宋子文院長知悉。⁶⁴

陳儀抵臺後，經過實地考察，更堅定他在臺灣實施獨立貨幣體系的決心，認為臺灣金融問題，發行貨幣應由臺灣銀行辦理，才能適應機宜，控制物價，安定人心。⁶⁵

1945年11月1日，陳儀令財政處長徐學禹電呈行政院長宋子文（東電）擬定「整理臺灣幣制辦法」七項，其中一項為「關於目前幣制，擬議接收後仍以臺灣銀行名義改用中華民國年號印製新券，與舊券同樣行使，除接濟軍政各項費用外，並用以掉回同額之舊幣」，⁶⁶亦即給予臺灣銀行印發新券自辦發行之權。此項辦法，可作為整理臺幣的過渡辦法，經財政部與陳儀一再商議後才告確定，並獲行政院核准。

11月7日，中央銀行陳行電告陳儀長官將派林崇墉專員赴臺設行，請多加維護：

關於中央銀行赴臺設行一節，前經在滬商洽，電部請示，茲奉財政部財錢丙741冬（2日）電開：「中央銀行赴臺設行，應予照原計畫前往辦理等因」，自當照辦，除飭該行林特派專員崇墉準備啟程前往外，特電請予維護為荷。弟陳行叩。⁶⁷

11月8日，財政部長俞鴻鈞以簽呈呈報宋子文院長，提出關於臺灣幣制問題意見，希望陳儀長官取消原議，仍准中央銀行發行臺灣流通券及設立分行，原呈要點摘錄於下：

63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24-425。

64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26。

65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27-428。

66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27。

67 「中央銀行電」（11月7日發，11月10日收），《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0325300009001。

- （一）中央銀行已經公布臺灣流通券發行辦法，以供使用及兌換臺幣之用，可與臺幣同價行使，中央銀行已派臺灣區特派員林崇墉赴臺設分行，但因陳儀另有意見，故未成行。
- （二）陳儀主張由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繼續發行臺幣，此與當日洽定辦法不符合，且和中央統一發行貨幣的政策抵觸。
- （三）懇請轉陳儀長官將原建議取消，協助發行臺灣流通券及赴臺設分行，以維持幣政。⁶⁸

是日，陳儀以臺灣省總司令部名義通告，嚴禁法幣在臺灣流通。⁶⁹

11月9日，陳儀電請宋子文核准「委託臺灣銀行發行辦法」，並趕印新臺幣流通券至臺灣使用，電文摘錄如下：

- （一）前蒙面示同意，中央銀行在臺灣不設分行，並囑整個接收臺灣銀行，維持其固有業務，十分感佩。
- （二）關於委託臺灣銀行發行辦法曾與俞部長面談，並於10月29日以豔電託其轉呈。
- （三）為整理本省金融，收縮通貨起見，於11月7日公布實施「日本銀行兌換券、臺灣銀行背書發行之日本銀行千元兌換券處理辦法」。此因該券多在日本軍人手中，約有80,000萬元，影響本省金融甚巨。
- （四）本省幣制亟宜整理，懇請賜予核准「委託臺灣銀行發行辦法」，並速飭中央銀行趕運臺幣流通券來臺應用。⁷⁰

11月10日，陳儀再電宋子文：

- （一）「整理臺灣幣制辦法」七項已蒙核准，給予臺灣銀行印製新券自辦發行之權，具見維護臺灣行政之至意。
- （二）臺灣自將日本銀行兌換券處理後，市面已有通貨收縮狀況，急需新券濟生，在臺灣銀行未印新券之前，請依照委託發行辦法，由

68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25。

69 見《臺灣新生報》，民國34年11月9日。

70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26。

中央銀行將印好之臺灣銀行流通券50,000萬元速運來臺，委託臺灣銀行發行。⁷¹

同日，財政部接奉行政院機字第2680號指令，因臺灣情況特殊，中央銀行暫緩在臺灣設立分行，臺灣幣制仍照陳儀長官所擬辦法辦理，臺灣流通券暫不發行。⁷²法幣與臺幣的爭議，至此已告定案。

由以上電文來往可知，宋院長於11月9日接電當天，就批准陳儀的要求，同意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發行臺幣，且不來臺灣設立分行，隨即發出指令財政部執行。

11月15日，陳儀致電行政院祕書長蔣夢麟，再三說明根據臺灣目前的情形，中央銀行不宜來臺灣設行，以免與臺灣銀行競爭，無法控制，電文如下：

臺灣金融問題，弟到臺後，體察實際情形，深覺發行必須由臺灣銀行辦理，方能適應機宜，控制物價，安定人心。至由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發行，或臺灣銀行自行發行，兩均無不可。惟中央銀行流通券業已印成16億元，為節省印費起見，自以利用此項印成之券委託臺灣銀行發行較為得計。……要之，中央銀行此刻決不宜來臺設行發行，致與臺灣銀行發生競爭，使弟無法控制，以致通貨膨脹，幣制混亂，物價高漲，人心動搖，皆屬必然。近日上海物價激漲，可為殷鑑。然上海係屬內地，臺灣則光復伊始，人心未固，此間美國顧問顧德理等皆與弟所見相同，囑堅持此方針勿稍移用。⁷³

最後，陳儀希望透過蔣夢麟向行政院長宋子文轉呈其意，因為財政部主事者「不明此間情形，偏執成見，使弟無法疏通，必須院長作主，弟方能在此待罪也」。可見陳儀認為財政部長與他看法不同，難以疏通，需委託蔣夢麟祕書長多費唇舌加以說服。

11月22日，財政部長俞鴻鈞致行政院祕書處公函，仍不放棄表示反對的意見，主張：

71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37。

72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31。

73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27-728。

- （一）中央銀行臺灣流通券應由中央銀行發行，如依照陳長官主張，轉手臺灣銀行發出，與中央統一發行之旨不符，且將招致外界疑慮，影響該券信用。
- （二）陳長官委託臺灣銀行發行臺灣流通券，又由該臺行印發新券，同時發行兩種新幣，更將引起貨幣之紊亂。
- （三）今後臺灣幣制，陳長官既已擬議以臺灣銀行名義改用中華民國年號印發新券辦法，呈奉鈞院核准，中央銀行臺灣流通券並奉鈞令暫不發行，自應遵照辦理，不必再事更張，以免分歧。⁷⁴

此時行政院已經核准陳儀由臺灣銀行用中華民國年號印發新券的主張，中央銀行流通券也不必在臺發行。中央銀行既不在臺灣設立分行，只有監督之權，乃制定「監理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辦法」。財政部當即停印流通券，並於1946年6月10日通過由財政部監理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的辦法。

12月13日，政府正式宣布中國、中央、交通、農民銀行四個銀行不在臺灣設立分行。⁷⁵

總之，臺灣實行獨立的銀行貨幣體系，在行政院於11月9日批准後確定，陳儀已經實際掌握臺灣改革貨幣金融的大權，隨即著手調整改組「臺灣銀行」，將其成立宗旨改為：「調劑本省金融，扶助經濟建設，發展本省生產事業。」經營範圍為存款、放款、貼現及押匯、國內匯兌、儲蓄業務、信託業務以及其他財政部許可之合法銀行業務，並受國民政府委託，辦理代募公債及其還本付息事宜、代理各級公庫、代理政府其他委辦事項，以及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所委託代辦的各項業務，成為光復後臺灣省金融機構的總樞紐。接著由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兌換舊臺幣，臺灣光復時，原臺灣銀行發行舊臺幣約為28億元至30億元，另有在臺灣流通之日幣6億圓至8億圓，共計約35-36億元臺幣。為收回這些舊臺幣，臺灣銀行先是委託中央印製局在上海印製新臺幣，後經行政院核准，給予臺灣銀行「印製新券自辦發行之權」。隨著在滬印製的鈔券陸續到臺，臺灣銀行宣布自1946年9月1日起，在

74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28-729。

75 見《臺灣新生報》，民國34年12月14日。

全省各地同時開始發行新臺幣，並收回舊臺幣。至同年12月12日止，共收回舊臺幣35億9,600餘萬元。總計陳儀主臺期間，經財政部批准，共發行新臺幣60億元，其中39億1,000餘萬元用以兌換舊臺幣，實際發行新臺幣20億5,000餘萬元。⁷⁶此舉逐漸以新臺幣代換舊臺幣，從而統一了臺灣省幣制。

此外，最重要的是阻止法幣在臺灣流通。政府允許臺灣繼續使用臺幣，但隨著內地前往臺灣人數的不斷增加，法幣與臺幣的聯繫問題日益突出。陳儀為阻止內地法幣氾濫影響臺灣省經濟，建議財政部制定「臺灣省匯兌管理辦法」。之後，經陳儀核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頒布「辦理中央駐臺機關部隊及本公署所屬各機關內地法幣收付暫行辦法」。陳儀在內地法幣漫天飛舞的情況下，嚴格控制來臺法幣的各種渠道，盡量減少法幣流入臺灣，無疑為防止法幣衝擊臺灣經濟築起了一道高牆。

陳儀為臺灣建立獨立的銀行貨幣體系，最大的影響是有效地防止內地法幣崩潰的災難衝擊臺灣，雖然臺灣當時的物價也在上漲，但與內地各省比較，漲幅相對低了很多。以上海和臺灣的物價做一比較，1946年12月上海的物價指數為580.9，臺灣為396，上海物價指數是臺灣的兩倍；1946年全年上海平均物價指數為391.5，臺灣為213.7，上海是臺灣的1.8倍。這不能不歸功於陳儀在臺實施的金融改革措施。由此可以肯定陳儀對於穩定臺灣金融的貢獻。⁷⁷

二、敵糖與臺幣流通的關係

從陳儀與行政院、財政部的公文往來內容可知，陳儀之所以能在臺灣建立獨立的銀行貨幣體系，阻止法幣在臺灣省流通，乃是陳儀力爭而來，並不是以15萬噸糖做為交換條件而得。亦即他先取得蔣中正的首肯，轉知宋子文認可，再行文財政部同意。葛敬恩在其〈接收臺灣記略〉一文，敘及陳儀在赴臺之前向蔣中正提出三條件建議，其中之一就是「為了保證臺灣不受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中、中、交、農

76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頁462。

77 以上陳儀對臺灣金融的改革，參考孫彩霞，〈陳儀與臺灣〉（上）（下），《海峽評論》，第74期、75期。

四大銀行暫不插足臺灣，仍運用原來的臺灣銀行管理金融」，這些建議都得到蔣中正的核准，「尤其是中央銀行的擋駕，特由蔣面囑宋子文，才勉強辦到」，⁷⁸由此文與檔案相互印證，更可確定是陳儀主動向蔣中正、宋子文爭取而來，其間必然經過激烈的爭執。除了上述的分析論證之外，還有以下四點可證明敵糖歸中央與臺幣獨立流通之事並無關係：

其一，送糖給中央與陳儀的禁止私運砂糖的統制政策不合：

從當時的經濟狀況來看，砂糖是當時戰後臺灣最重要的物資，是唯一可以增加收入的農產品，而且大陸糖價高漲，為避免商人走私運糖獲利，增加臺灣省庫財政收入起見，陳儀下令禁止砂糖私運出口，規定只有貿易局才能售糖。在11月初成立的臺灣省貿易局的工作計畫中，已經把這批從日人手中接收的敵糖列入1946年度臺灣省出口貿易項目中，並且於12月初發佈禁令，禁止臺糖私運出口。柯遠芬說陳儀主動將這批數量龐大且價格昂貴的敵糖送給中央做為交換條件，顯然與陳儀的禁止私運砂糖的法令相互違背；而且在缺糖的情況下，又會造成臺灣的糖價上漲，更是不合乎他的統制經濟政策。所以陳儀不可能將臺灣省的大筆財源——15萬噸敵糖，自動奉送給中央，讓中央賺錢獲利，而地方無糖可售，財政拮据，除非是中央的強制命令。

其二，行政院同意法幣不在臺灣流通的時間，與臺灣省貿易局計劃銷售敵糖的時間相同：

1946年11月10日，財政部已經奉行政院指令，決定中央銀行不到臺灣設行發行法幣，由臺灣銀行發行臺幣的時間，臺灣省貿易局也大約在同一時間計劃將於1946年度出售敵糖，亦即法幣不來臺灣的決定與臺灣省貿易局的售糖計畫，兩者是在11月中同時進行。換句話說，當時陳儀一面極力爭取使行政院同意不來臺灣設行發行法幣，一方面由臺灣省貿易局計劃出售敵糖，所以當然不可能將敵糖再奉送給中央做為交換條件。

其三，行政院同意法幣不在臺灣流通與電令敵糖歸中央的時間不同：

日本四個製糖株式會社的存糖，在1945年11月底監理時期清理後，已從原有的

78 葛敬恩，〈接收臺灣紀略〉，李敖編著，《二二八研究三集》，頁166。

34萬噸減少為約18萬噸，至1946年4月初，接管委員會接管敵糖時，只剩14萬8,176噸，亦即所謂15萬噸數目的敵糖在4月初才確知。而法幣與臺幣爭議的時間是在去年（1945年）11月，當時監理清查存糖數目是17萬多噸，而接管敵糖的時間是在1946年4月，行政院在此時才確知敵糖數目為15萬噸，於是電令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和臺糖公司代運至上海銷售。法幣與臺幣之爭和敵糖歸中央的時間前後相差五個月，兩者無法吻合，由此可以推知兩事之間毫無關係。陳儀在力爭臺幣發行權時，還不確知敵糖的實際數目。

其四，陳儀行政長官擁有很大的權限和主導權：

從「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的權限來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具有行政、立法、軍事大權，又可管轄中央在臺機關，權力很大，尤其在行政方面有很大的主導權，再加上陳儀強勢的軍人作風，蔣中正、宋子文、俞鴻鈞都必須禮讓三分，雖然不十分贊成，但也不得不同意他的主張。

由上述四點可以證明，陳儀將15萬噸糖主動送與中央以換取法幣不來臺灣的說法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伍、十五萬噸糖的去向

由本文第叁節、第肆節的分析可知，陳儀在1945年11月中旬已經獲得行政院的同意，中央銀行不來臺灣設分行發行法幣，也不運送臺灣流通券來臺，由臺灣銀行自行印發臺幣，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只負責監督的工作。同時，臺灣省貿易局也訂定1946年度的工作計畫，將15萬噸敵糖納入這年的銷售計畫，不料行政院於1946年4月中電令將敵糖運往上海銷售，以致於原訂的銷糖計畫無法實現。6月8日，陳儀致電行政院：「糖之輸出，奉院長規定交由上海敵偽產業處理局統籌銷配，不由本省自賣。」⁷⁹1947年1月臺糖公司創立會的檔案紀錄，亦有「上年本公司受政府委託，將在臺接收之敵糖運銷上海，充分供應。照目前估計，存糖尚足供應至本年

79 陳興唐主編，〈臺灣現狀報告書〉，《臺灣二二八事件史料》，上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年2月），頁66。

底新糖大量生產時止，無虞匱乏。」⁸⁰可知臺糖公司代運代售這批砂糖，預計將銷售至1947年底為止。

一、中央糖的銷售

臺糖公司於1947年6月21日將中央糖銷售經過電告資源委員會，茲摘錄於後：

查本公司於35年5月在滬開始營業，遵照行政院指示，每期銷售食糖數量，中央占8分之7，公司占8分之1。並由資源委員會確立二項營業方針：（一）除大量用戶及消費合作社直接配售外，採取躉售方法售於糖行，不作零售業務。（二）定價必低於市價，以收平抑物價之效。

至於食糖之開售，每星期一次，最初數期，滬市各糖行因本公司大量供應，糖價極為平穩。嗣因運輸困難，由臺運滬數量無多，計5月份運到4,500噸，6月份更減至1,500噸，遠較預計數量為少，糖商察知公司存糖不豐，將市價逐步抬高，本公司當時深恐定價太低，不僅坐使商人獲得暴利，且虞存貨或將全部為糖商購罄，則市場將無法控制，故不得不於6月22日至23日之間，直接拋售700噸，藉以平抑漲風。23日接臺灣電稱，臺糖即可運滬，各方需要仍殷，乃將現貨悉數出售，並預售3,000噸，一場風波始獲平息。⁸¹

以上是剛開始售糖的狀況。而後為了穩定糖價，臺糖公司與上海市社會局洽商組織「糖價審議委員會」，由社會局、參議會、糖業公會、南貨業工會，及臺糖公司各指派代表一人為評議員，實行議價。當時臺灣、上海之間輸運暢通，食糖供給不虞匱乏，糖價遂漸趨穩定。迄至1947年2月初，因一般物價猛漲，糖價又起波動，各糖商均超過實際需要逾額申請配售，臺糖公司根據過去經驗，為避免存糖被商人大批套購，導致以後每月無法供應起見，又更改配售辦法，停止自由申請，根據各糖商過去各期購買額的平均數規定本期配售量。此外，臺糖公司並以平價供應

80 「臺灣糖業有限公司創立會紀錄」（民國36年1月19日），《臺糖公司微捲檔案》，臺糖公司藏，微捲號：1463.401.1。

81 「中央糖銷售經過」（民國36年6月21日），發文號：雨3365，《臺糖公司微捲檔案》，臺糖公司藏，微捲號：1457.264.1。

京滬區公教人員食糖及上海市戶口糖。⁸²

實行新配售辦法後，一切尚稱平靜穩定，未料不久即發生228事件，臺糖公司沈鎮南總經理因見事態嚴重，即於3月3日將中央接收敵糖15萬噸糖對事件發生的影響向資源委員會報告，請將糖款撥歸臺糖，交存臺灣銀行，以充臺銀匯兌基金，償還公司借款，以穩定幣值，避免物價飛漲，並減少民怨。電文如下：

此次臺北事件，雖由私煙而起，亦因人心積怨甚深，一觸即發。此後經濟設施極應重行檢討，以防燎原。糖業方面緊要事項有下列三點：……

(3) 中央接收敵糖15萬噸，民間甚表憤慨。臺灣物價高漲，幣值低落，均歸咎於糖款不能回臺所致。務乞轉懇行政院將國幣糖款撥歸公司，交存臺灣銀行。一面償還臺糖公司借款，一面充臺行匯兌基金，藉以穩定幣值，減少民怨。⁸³

1947年3月22日，因情況緊迫，沈鎮南再電資源委員會錢昌照、吳兆洪正副委員長，請將下四期的糖款做為臺糖公司自售之糖，以救燃眉之急：

事變以後臺灣銀行頭寸甚為拮据，本公司分糖蔗款、工程費用、員工薪津均無法應付，不得已祇將實物砂糖分與蔗農，以資補救，同時一面準備在臺出售少數砂糖。並為應急起見，擬囑上海業務處將下四期售糖款項作為本公司自售之糖，將國幣交與臺灣銀行辦理匯兌，換取臺幣，以救眉急。務懇准予備案，祈電示以便電滬照辦。⁸⁴

資源委員會於4月1日覆電沈鎮南，說：

(一) 公司需款可暫移用中央銀行所存糖款。

(二) 下四期售糖視需要情形酌移作自售糖，已與(宋)以信兄在京商洽妥當。

82 「中央糖銷售經過」(民國36年6月21日)，發文號：雨3365，《臺糖公司微捲檔案》，臺糖公司藏，微縮號：1457.264.1。

83 「臺灣糖業公司沈鎮南等為糖業弊病及物價高漲幣值低落引起人民反對情形致資源委員會電」(1947年3月3日)，《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冊)，頁163-164。

84 「沈鎮南致錢昌照、吳兆洪寅養電」(民國36年3月22日)，《資源委員會檔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案卷號：8194。

（三）15萬噸糖事等政局稍穩定後，再相機進行。⁸⁵

4月12日，資源委員會仍將臺糖公司的意見呈報行政院：

……查該公司接辦以來，存糖15萬噸，悉中央出售，所得國幣款項公司及臺灣銀行均無法應用，目前需款籌措惟艱，茲暫將中央銀行所存糖款一部分移存臺銀上海分行，俾可充實該行法幣頭寸，在臺接濟臺糖公司緊急費用。⁸⁶

結果財政部核覆，認為國營事業機關營運資金及事業費應以存放國家銀行為限，臺糖公司所請與規定不符，未便照辦。⁸⁷臺糖公司所有呈請希望能運用糖款以緩解財務困難的努力，皆被行政院駁回。臺糖公司正在緊急請求資源委員會協助救濟之際，未料臺灣政治社會發生嚴重的228事件，情況因而改觀，及時扭轉危機。

二、白崇禧的臺政改革意見

自228事件發生以來，臺灣情況不穩，政府當局有鑒於事態嚴重，除派兵前往平亂之外，一面指令國防部長白崇禧赴臺處理並宣慰臺灣同胞。白崇禧於1947年3月17日奉命偕同蔣經國處長、吳石局長等20餘人前往，向臺胞說明此行目的在於「對此次的紛擾事件，查明實際情形，權宜處理。」迄至4月14日，白部長以「天露0591號」簽呈，提出「今後臺政改正意見」，內容包括：行政、經濟、教育、軍事四大項，第五項「其他」的第四點正是有關15萬噸敵糖的處理方法，原文如下：

查抗戰勝利後，臺省接收封存敵糖15萬噸，嗣奉行政院令，應運滬變價，收歸國庫，在前項食糖未售完前，限制臺糖運銷內地，只准銷8分之1。查臺糖公司係中央與臺省合營，規定其生產百分之六十歸國庫，百分之四十補助臺省。現前項敵糖已銷出半數，似可將未售出之半數，約值國幣10億元，撥給臺糖公司，以增加臺省銀行法幣周轉，必能安定臺省

85 「吳兆洪電沈鎮南」（民國36年4月1日），《資源委員會檔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案卷號：8194。

86 「資源委員會呈行政院長張羣」（民國36年4月12日），《資源委員會檔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案卷號：8194。

87 「行政院指令資源委員會」（民國36年6月5日），《資源委員會檔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案卷號：8194。

金融，並協助臺省經濟。⁸⁸

國府祕書長對白崇禧的簽呈擬辦辦法如下：

所請將敵糖15萬噸未售出之半數，撥交臺糖公司一節，既與實際劃分標準僅差一成，擬准交行政院照辦。⁸⁹

白崇禧認為行政院強令將15萬噸糖運送上海銷售，又不准臺糖銷售新糖，並不合理，所以提出補救辦法，建議敵糖既已銷出半數，似可將未售出之半數，撥給臺糖公司，以增加臺灣銀行的法幣週轉，以安定臺省金融，並協助臺省經濟發展。因為臺糖公司為國省合營企業，資本額及分紅的比例為6：4，敵糖是政府接收的敵產，至少應該按照比例分配，不應由中央獨占，現既已被中央賣出一半，與60%股份比只差10%，若把剩餘一半敵糖還給臺糖公司，如此不僅使中央與地方兩得其利，又可平息民怨。此一決定可謂非常明智，該項辦法經過蔣中正主席批准後，即交由行政院照辦。

5月20日，行政院函知資源委員會，蔣中正主席已電准將敵糖一半劃歸臺糖公司。5月27日，臺糖公司接到資源委員會之資（36）業字第00738號訓令如下：

頃准行政院祕書處5月20日從洪字第19063號公函抄附主席卯養府交10872號原代電一份，略開：「據國防部白部長4月14日天露0591號簽呈，關於今後臺政改革意見（中略）三項，所請將敵糖15萬噸未出售之半數，撥交臺糖公司一節，既與實際劃分標準僅差一成，可准照所請辦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遵辦，此令。⁹⁰

據此電令，臺糖公司終於可以和中央平分敵糖之一半，中央得75,000公噸，臺糖公司得73,176公噸，約可換取國幣10億元，及時解決公司的財務困窘狀況。

根據臺糖公司統計，自1946年5月份起，至1947年5月份止，臺糖公司代中央售出糖144,328,337斤，虧耗3,691,727斤，皮貼1,925,936斤，共計150,000,000斤（即

88 「白崇禧致蔣主席簽呈」（民國36年4月14日），《二二八事件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1年2月），頁95-101。

89 「白崇禧呈蔣主席簽呈今後臺政改進意見」（民國36年4月14日），《二二八事件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1年2月），頁101。

90 「資源委員會訓令臺糖公司」，《臺糖公司數位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40-35-017.1.1-1，35-31-1463-0626，原微捲號：1463。

75,000噸）。收入方面計銷糖收入 187,147,767,172.30元。1946年度銀行存款利息收入693,784,237.19元，共計國幣187,841,551,409.49元。開支方面，遵照行政院指示，臺糖公司代辦運銷之糖，除自臺灣各地點起運至上海或其他各地貨棧，一切捐稅、水腳、倉租、保險等費用，核實報支，另由政府補貼公司管理推銷費用，依照售貨收入百分之二計算，故總計代中央支出貨物稅、消費稅、輪船運費、保險費、棧租費、代銷貼補費、加工提煉費等，共計國幣43,447,346,573.65元，收支相抵，尚餘144,364,204,845.84元。⁹¹

臺糖公司於1947年 6月16日代電各區分公司結算中央砂糖：

……查代銷中央敵糖75,000噸業經先後售出，奉前令自應從速結帳，除分電外，特檢附「代銷中央砂糖結算辦法」一份，相應電轉查照即賜辦理，並將辦理情形詳覆為荷。總公司。雨已。皓。財綜。印。⁹²

其中結算辦法還包括各區分公司應按照接收舊糖比例分攤繳納中央75,000噸砂糖數量，第一區分公司40,449.71公噸，第二區分公司14,619.18公噸，第三區分公司13,300.16公噸，第四區分公司6,608.95公噸。⁹³15萬噸敵糖幾經一年的周折，至此終獲解決。

陸、結 論

臺灣光復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和臺糖公司先後接收日本留下的砂糖，但是不久就奉行政院命令將這批敵產歸屬中央，由臺糖公司代為精煉再代運至上海銷售，所得糖款納入國庫，而且不准臺糖公司銷售新糖，形成中央增加收入，地方無

91 「中央糖銷售經過」（民國36年6月21日），發文號：雨3365，《臺糖公司微捲檔案》，臺糖公司藏，微捲號：1457.264.1。

92 「臺糖公司代電各區分公司」（民國36年6月19日、雨已皓財綜第2483號），《臺糖公司數位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40-36-123.4-1，35-31-1457-0624～0625，原微捲號：1457。

93 「臺糖公司函各區分公司」（民國36年6月19日、雨已皓財綜第2432號），《臺糖公司數位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40-36-123.4-1，35-31-1457-0619～0621，原微捲號：1457。

糖可賣的現象，此一狀況在當時民間傳言甚囂塵上，說陳儀私下將15萬噸糖送給中央，致使糖價上漲，造成地方財政困難，累積民怨甚深，要求將15萬噸糖款撥還臺省。直到228事件爆發後，中央派遣白崇禧來臺調查事件發生原因，才發現這15萬噸糖繳歸中央，竟是累積民怨之一，於是建議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將所剩一半的敵糖撥還臺糖公司，以平息民怨，此15萬噸糖所造成的暗潮爭議總算獲得解決。這段15萬噸糖的來龍去脈，經過本文的考證分析，大致已釐清。茲將研究結果再總結如下：

一、陳儀並不需要，也未以15萬噸糖做為交換條件，以獲得中央同意使法幣不來臺灣流通。

由於臺灣行政長官擁有絕大的自主權力，以陳儀的強勢作風，首先獲得蔣中正的同意法幣不來臺灣流通，再由蔣轉知宋子文，財政部長俞鴻鈞雖然極力反對，但也無可如何。而將敵糖無價送給中央，與陳儀的專賣統制經濟政策矛盾，也與禁止私運食糖出口的政策相違背。而且法幣與臺幣之爭定案的時間，是在1945年11月中，而臺灣省貿易局同時已經計劃在1946年度銷售這批敵糖，怎麼可能將敵糖做為交換條件，這兩件事是同時進行，絕不可能一面送糖，一面又賣糖，自相矛盾。而且最後確定接收敵糖數量是15萬噸糖的時間是在1946年3、4月間，行政院電令運糖的時間是4月初，臺糖公司在上海賣糖的時間是5月，所以從時間點上來看，法幣不來臺與敵糖兩者毫無關係。

二、15萬噸敵糖歸中央所有，是228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

15萬噸糖產自臺灣，毋庸置疑應當屬於臺產，才合乎實際狀況與臺灣人民的願望。然而敵糖被迫撥歸中央所有，使臺灣人民認為中央搶奪地方財產，因而造成物價上漲，人民心生怨恨，則是事實，成為政府接收臺灣以來累積的民怨之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吾人從「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將15萬噸糖列入政治改革的項目條文，要求將15萬噸糖歸還臺灣省，相當程度地反映當時人民的願望。再從沈鎮南緊急給資源委員會的電文中，提出15萬噸敵糖被中央當作敵產銷售，造成砂糖數量減少，糖價飛漲，幣值低落，對臺灣經濟影響甚深，引發民怨；對臺糖公司而言，更是需要這筆糖款做為重建糖業經費，歸還所欠銀行借款，和臺灣銀行匯兌資金，

希望儘快撥還這筆糖款以解決問題。白崇禧的「改革臺政意見」中明白表示，行政院令將敵糖運滬變價銷售收歸國庫，又規定在敵糖未售完前，限制臺灣新糖運銷內地，確實不當。故建議將所售剩一半的糖歸還臺糖公司，可謂為切中時弊，亡羊補牢之策，冀望藉此能挽回臺灣同胞之心。試想，若不是因為敵糖歸中央累積民怨甚深，白崇禧也不致於將此事列入改革意見而向蔣中正提出。故知15萬噸糖所導致的民怨也是228事件發生的因素之一。反過來說，若不是發生嚴重的228事件，使中央政府警覺到必須立刻紓解民怨，這15萬噸糖也許不可能再撥還臺灣省，此兩者之間互為因果關係，確實值得當政者深思。

三、交換條件說是來自柯遠芬的口述回憶，可知回憶錄必須謹慎考證方可引用。

因柯遠芬已故，無法當面查證其口述資料來源，只能從旁證著手。按陳儀為柯氏直屬長官，最後遭到槍斃命運，柯氏有意為維護其長官，宣揚其德政，以減輕他治臺的罪惡感，亦為人情之常，但若無實證，也難免落入虛空杜撰之嫌。李敖引用他的說法，說陳儀用15萬噸糖抵制法幣來臺，不讓孔宋豪門資本染指臺灣，在《二二八研究三集》前言中，力說陳儀並不如一般人所說之惡，認為他不過是「國民黨的替罪羊」，還稱讚他對臺灣人民的貢獻，說他「無負於國民黨，無負於臺灣人」，而李敖的說法又被其他作者引用，使得歷史真相更加混淆，成為史事專題研究的盲點。實則口述回憶雖是當事人敘說當時事，但也可能隱諱其過宣揚其善，甚至過度誇功，因此回憶錄和口述訪談的可信度仍須經過考證才堪引用。

從本文對於15萬噸敵糖問題的探討，終於使15萬噸糖的接收經過真相大白，由此可以瞭解光復初期臺灣售糖的情形及其問題所在，並看出政府在戰後對於臺灣的接收政策和治臺政策確實稍嫌草率，可謂只見其小，不見其大，只顧中央，不顧地方，使接收變成「劫收」，為臺灣同胞所詬病，以致發生嚴重的後果，政府的政策和處理方式欠當，自然難辭其咎，必須檢討改進，使後世為政者引以為戒，勿再重蹈覆轍。（責任編輯：周琇環）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 《臺糖公司檔案》微捲（臺南，臺糖公司藏）
《臺糖公司檔案》數位化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資源委員會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資源委員會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資源委員會檔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行政院檔案》（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二）專書

- 陳興唐等，《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年。
李敖，《二二八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2月28日。
李敖，《二二八研究續集》。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2月28日。
李敖，《二二八研究三集》。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2月28日。
陳明言，《臺灣的糖業》。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2月。
魏永竹、李宜鋒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81年2月。
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2月。
賴澤涵、黃富三等，《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2月。
薛月順編，《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第1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2年6月。
薛月順編，《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第3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3年12月。
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三）》。臺北：國史館，民國88年2月。

張季熙，《臺灣糖業復興史》。臺北：中國工程師協會，1958年。

鄭友揆、程麟蓀，《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袁穎生，《光復前後的臺灣經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7月。

潘志奇，《光復初期臺灣通貨膨脹分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4月。

戚嘉林，《臺灣二二八大揭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年2月。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

陳兆偉，《國家經營下的臺灣糖業》。臺北：稻香出版社，民國92年2月。

臺糖公司，《臺灣糖業概況》。臺北：臺糖公司，民國35年12月。

臺糖公司，《臺糖三十年發展史》。臺北：臺糖公司，民國65年5月。

中國工程師學會，《臺灣工業復興史》。臺北：中國工程師學會，1960年6月。

吳尊賢，《吳尊賢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4月1日。

《臺灣建設》，下冊。臺北：民治出版社，民國39年11月。

鄭梓，《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北：新化圖書有限公司，民國83年3月。

許介麟，《戰後臺灣史記》，卷1。臺北：文英堂出版社，1996年9月。

（三）期刊論文

張季熙，〈糖業〉，《臺灣工業復興史》。臺北：中國工程師學會，1958年。

吳聰敏，〈戰後臺灣的惡性物價膨脹（1945-1950）〉，《戰後1950～60年代的歷史省思—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八屆討論會論文集》，2007年12月。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糖業有限公司接收敵糖之經過報告〉，《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

吳尊賢，〈人生七十〉，《講義雜誌》，1988年3月號。

王思翔，〈臺灣二月革命記〉，《臺灣舊事》。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5年2月。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像〉，《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省文

獻委員會，民國81年2月。

孫彩霞，〈陳儀與臺灣〉（上）、（下），《海峽評論》，第74期、75期。

葛敬恩，〈接收臺灣紀略〉，《二二八研究三集》。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2月28日。

陳興唐主編，〈臺灣現況報告書〉，《臺灣二二八事件史料》，上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年2月。

何漢文，〈臺灣二二八起義見聞錄〉，《二二八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2月28日。

黃彰健，〈揭穿王添灯欺騙臺灣人民—論二二八處委會3月6日提出處理大綱320條、3月7日提除42條、3月8日提出32條〉，《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2月。

薛月順編，〈臺灣省貿易局三十五年五月第三週工作報告（5月15日）〉，《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第1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2年6月。

臺糖公司經濟研究室，〈光復以來之臺灣糖業〉，《臺灣糖業季刊》，創刊號。臺北：臺糖公司，民國36年10月。